

## 将田野“事件化”——四川蒲溪尔马释比音乐影像志田野反思

郭羿努

武汉音乐学院 湖北武汉

**【摘要】**科学领域实证性的研究会经过猜想、演算和实验的过程，并不断重复乃至得到一个普适性的宏观真理，这是我所理解定量研究。所以一切对象在未经过实证之前都只能是一种猜测，而不能成为事实。反观音乐人类学，它出自经验科学，以文化研究为本质的特性使得质性研究在其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并且这种研究方式赋予了其人文学科独有的气质。虽然实证研究的方法必然是需要的，但人的行为似乎并不是通过实证研究能够得出答案的。人类学家进行田野工作的目的也绝不是为了得到一堆冰冷的数据和表格，并将其分析之后得出一个“结论”。而是通过这种研究，去追求一种“理解”的可能性。这便使得田野工作成为游移于定量与质性、理性与非理性中的“介乎其间”。

**【关键词】**田野工作；事件化；音乐影像志；音乐人类学

**【收稿日期】**2026 年 2 月 15 日 **【出刊日期】**2026 年 3 月 16 日 **【DOI】**10.12208/j.sdr.20260023

### Eventualizing the field: Reflections on Erma Shibi in Puxi, Sichuan fieldwork in the musical ethnography films

Yinu Guo

Wuhan Conservatory of Music, Wuhan, Hubei

**【Abstract】**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e scientific domain follows a process of conjecture, calculation, and experimentation, which is iterated continuously until a universally applicable macroscopic truth is derived—this constitutes my understanding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Accordingly, any proposition remains merely a hypothesis rather than an established fact prior to empirical verification. By contrast, as a discipline rooted in experiential science and essentially oriented toward cultural studies, musical anthropology accords a prominent posi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which endows the field with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inherent to the humanities. While empirical methodologies are undeniably indispensable, human behavior appears resistant to definitive elucidation through quantitative empirical approaches alone. The objective of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is by no means to acquire a set of impersonal data and tabulations, nor to formulate a conclusive assertion via analytical processing. Instead, it seeks to pursue the possibility of 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 through such investigative practices. Consequently, fieldwork in musical anthropology emerges as an intermediary domain situated between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paradigms, as well as between rationality and non-rationality.

**【Keywords】** Fieldwork; Eventualization; Musical ethnography films; Anthropology of music

#### 1 从“书斋”到“田野”：案头与田野的互视

19 世纪中后期的人类学家，因其研究材料多来源于二手文献，而被称为“扶手椅”上的人类学家。在这一时期，“文献”几乎成了专注于构建“人类学大厦”宏大理论的唯一支撑。而随着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博厄斯提出的“文化相对论”以及马林诺夫斯基对“参与观察法”的建立和发展，人类学家的工

作方式迅速地从“扶手椅上的沉思”转为了“牛背上、马背上的田野工作（fieldwork）”。这一转变不仅要求人类学家尽可能地参与到“当地人”的生活当中，并尽可能地搜集田野中的一手材料。而更为重要的是，在确立了人类学田野工作范式之后，大量以非西方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田野民族志，开始试图与霍布斯、孟德斯鸠、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福

柯等理论家所勾勒的问题域展开对话，并形成各自的中层理论。自此，当我们在面对田野以及田野工作最终成果的产出之前，便有了一个重要的环节“文献综述”。正如刘桂腾教授所言：

文献综述的目的—是将研究项目置于学科史脉络之中，使读者能够知道前人或别人在此领域中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二是将你的研究与前人或别人的研究进行比较，使读者能够知道哪些是新发现，哪些是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的拓展，哪些是与既有观点不同的见解；三是为其他研究者提供参与相同领域研究的线索<sup>[1]</sup>。

因“拓荒时代”的落幕，如今的研究者（特别是正处于学习阶段的学生）往往无法仅仅通过描述事实的疑问或探讨不同社会学变量之间关系的一致性来提出问题，他们大多在初步确立研究对象之后，便匆匆进入“文献”，并寻找“中层理论”以寻找和确认该研究对象可能存在的研究意义与问题意识。但当我们审视各式各样的“中层理论”时，我们却时常忽略一个重要的问题：“我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

此时，经典理论便开始凸显出它的意义，“正是经典文本化约了复杂性，确立了我们所讨论问题的最低共识；也正是经典文本为社会学提供了独特的、非进步性的贡献。”<sup>[2]</sup>

虽然所处的学科不同，但这种分层结构同样适用于本学科。如果借用默顿的观点，对于基本问题的研究，是源于对社会的观察。那么经典理论的确不能在整个提问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发现问题之后，通过对“中层理论”的综述确定问题的学术价值，再进行研究工作的假设。可惜的是，这种研究流程看起来是这么“顺眼”，似乎绝大多数学者（学生）都在按照这种思路完成自己的研究。此时的研究过程，变成了选择研究对象—寻找中层理论—在自己的研究中重新“验证”中层理论。这一过程的问题在于，“问题意识”并非由中层理论的推导所演算出来的，纵使建构了一套能够解释某个音乐形态的框架，但也就是仅此而已。它为什么会呈现这种形态，却是这个框架无法解决的问题。

所以，经典理论能为我们做什么？或许我们所需要的并非这些经典理论、中层理论的堆砌和套用，而是学习它们如何捕捉问题的视角、建构、联通问题的逻辑。我们所需要的是在田野中搜寻“猎物”的

敏锐嗅觉，在分析田野材料时，能够展开我们的想象力。致使我们在真正进入田野之后，能够敏锐地察觉那些可能与曾经读过的经典理论、中层理论相连接的现象，从而避免“自我建构”。

笔者认为概念套用与自我建构不仅是“抽象经验主义”的体现，同时也是将田野经验积累与体验变成一种“概念实证”的过程，从而偏离以人的文化为终极目的的学术轨道。这可能也是术语研究的目的之一，即当面对田野中无法用“我”所理解的话语、文字对“他”所表达的意义进行转化时，术语则成为“我们”进入“他们”最关键的“钥匙”。而我们能否运用这把“钥匙”的前提就在于田野时间的长短与田野工作量的大小。

## 2 案头工作的重要性——以四川阿坝藏羌自治州音乐影像志拍摄工作为例

2019年3月5日—16日，在萧梅教授、刘桂腾教授的带领下，笔者作为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阿坝羌族释比响器调查”小组的成员，前往四川阿坝藏羌自治州的汶川、理县、茂县，拍摄果若（羌族还愿仪式）和“央儒节”。此次田野的特殊性在于其最终成果体现为“音乐影像志”，这就意味着我们具备将田野“事件化”的能力，并用镜头及时地捕捉。笔者虽长期接触摄影，具备拍摄影像志的相关理论。但真刀真枪地进行音乐影像志田野，这还是第一次。

从成都经三个半小时的车程，我们来到了理县蒲西乡休溪村。这里深居高山之中，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南缘，海拔2700多米。下车后，我就拿起摄像机匆匆地开始了“央儒节彩排”过程的拍摄工作，在拍摄的过程中，面对陌生田野的茫然与困惑逐渐强烈。我能做的只是拿起摄像机记录下我眼睛所看到的东西。结果是，当天晚上做场记的过程中发现几乎没有一个可以用的镜头，第一次拍摄以失败而告终。

第一天的拍摄任务之所以失败，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案头工作的缺失，由于此次拍摄任务是临时通知，由于时间紧迫，并未在拍摄前开展有效的案头工作，导致对于田野对象的了解不够。其次是方法层面，对于动态画面的记录与静态画面的记录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动态画面强调的是事件的完整性，“谁，在什么时候，在哪里，用什么方式，唱了什么，唱给谁听？”借用海德的《影像民族学》—

书中所提出的三个完整性即完整的身体、完整的行为、完整的人物。但显然，静态画面的记录很难包含上述目的，至少我们很难用静态的画面反映“如何唱，唱了什么”的内容。这就导致笔者在第一天拍摄的镜头中仅出现了人物，但完全忽略了“完整的行为”。但归根结底，技术层面的问题同样是因为案头不足所带来的茫然造成的。也就是说，田野案头工作的缺失，也在一定程度上致使镜头语言缺乏基本的“完整性”。

案头的恶补可以在之后的田野过程中，通过摄像机记录访谈的过程，搜集一些关于田野对象与两个仪式的基本信息。所以我当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先老老实实地拍好一个镜头，一定要控制住自己，尽量减少推拉摇，使画面先定下来。

### 3 田野事件的捕捉：“不开口的老释比”

3月6日晚饭后，当地人老韩突然告诉我们：

“半个小时后，开始果若仪式，你们要拍吗？”我们没有丝毫犹豫，马上拿上设备前往了果若仪式的现场。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准备过程拍摄完成之后，刘桂腾教授便让我自己尝试拍摄，他只在摄影的空档时以“手语”辅助镜头语言。整个表现唱经过程的片段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一个全景，是笔者对仪式环境和人物的介绍，同时也是笔者观察他们行为的一个过程。在仪式现场中笔者发现，相对年轻的四位释比坐在中心位置，而年长的释比却分坐两旁。这引起了笔者的好奇“为什么经验丰富的年长者，反而坐在边缘的位置？”

笔者带着这个问题在接下来拍摄过程中，进一步发现唱经的任务几乎由四位相对年轻的释比执行，而最边上的两位理应坐在中间演唱的老释比，却几乎全场都没有张嘴。



图1 理县羌族果若仪式



图2 “不开口的老释比”

笔者当时并不知道其中缘由，只是隐约感觉这段镜头里“不开口的老释比”似乎是一个“不太寻常”的现象。此时，笔者想到孙立平提出的“过程—事件分析”其强调在田野中要善于抓住“有事情的时候”，要捕捉那些“有时纯粹是偶然的随机的联系”，要从静态的结构分析走向动态的实践分析。也正是因为这个不寻常的发现和捕捉，使得笔者在拍摄工作完成之后有机会对这一现象进行“事件化”并深入发散。在后来与当地人的交谈过程中笔者了解到，老释比不开口是因为他们学习的方式是口传心授，在他们学习释比的时候，果若就已经消失了，再加上没有现代教育的背景，他们在这场由年轻释比复原的果若当中自然是开不了口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不想唱，而是不会唱。老韩运用多年在茂县歌舞团工作的经验，并融入了参加释比活动的经历“发明”了夬儒节。王小刚作为果若的主要执仪人之一，根据附近其他村落的果若仪式和已经出版的《释比图经》《释比经典》将当地的果若进行了部分的复原。他们都是当地作为释比文化具有“发言权”的权威。也就是说整场看似“传统”的果若仪式，实际上是已经经过“创作”的“被发明的传统”。

在我们拍摄果若唱经的过程中发现，老韩中途就离开了。后来得知他离开是因为没能参与到果若仪式复原的整个过程。这样的一个画面，事实上又是一个可以使我们田野深入的事件。两个事件的背后透露了当地文化话语权的争夺与更替。话语权从之前老韩的“独唱”，变为了现在与王小刚不经意的对抗，老释比的精通，变为了现在的“开不了口”，事实上局内人内部在文化复原与发明过程中进行着微妙的博弈。

所以，田野之中的“平日”，是文化持有者日常的生活肌理，是释比文化在蒲溪尔马村落里自然的存续状态，而那些“超越平日”的事件，并非凭空出现的特殊场景，而是平日文化逻辑、社会关系的集中迸发与微妙显露，就像果若仪式里不开口的老释比、夬儒节创制者老韩的中途离场，皆是藏在日常肌理下的矛盾与变迁，被田野中的偶然瞬间撕开了一道缝隙。

在蒲溪尔马的村落里，日常的释比活动或许只是老人们零星的念诵、响器的随意敲打，年轻释比的零散学习，这些平淡的日常看似无甚研究价值，却正是文化存续的底色。而当夬儒节的筹备、果若

仪式的复原成为村落中的特殊事件，平日中潜藏的文化话语权博弈、传统传承的断层、文化重构的尝试，便都在这些事件中具象化。我们在田野中追寻的，从来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事件与平日的联结——老韩创制夬儒节的背后，是他多年在歌舞团的经历与本土释比文化的融合，这是他的日常积累；王小刚复原果若仪式，是他对周边村落仪式的观察与典籍的研读，这也是他的日常实践。

这些超越平日的事件，实则是平日生活的延伸与折射，若脱离了对平日的观察与理解，便无法真正读懂事件背后的文化深意。田野工作者要做的，便是沉下心来融入村落的平日，以细腻的感知捕捉那些打破日常节奏的瞬间，从老释比沉默的嘴角、老韩离去的背影、年轻释比唱经时的生涩中，看见释比文化在当代的传承困境与重构尝试。也正是这些从平日中生长出来的事件，让音乐影像志的记录不再是冰冷的画面堆砌，而是有温度的文化叙事，让我们对蒲溪尔马释比音乐文化的理解，从表面的仪式形态，深入到文化持有者的行动与内心，真正实现田野研究中对“人”的关注，对文化鲜活实践的把握。而这，也正是田野“事件化”的核心意义——以事件为锚，勾连起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让看似零散的田野片段，成为解读本土文化的完整脉络。

#### 4 结语

当我们试图透视音乐与文化持有者之间的关系，兴许会将其中的各类关系定格下来，以一种相对静态的方式进行研究。基于“制度—结构因素对个人行为有效”的预设，我们会更倾向于去关心与回答“这是怎样一种关系？”“什么因素造就这类关系模式？”

关注点过于集中于结构的探析，会忽略他们关系中至关重要的方面——“音乐与文化持有者之间的关系在现实的生活中是如何运作（体现）的？”，而诸如此类问题的最终呈现，便隐藏于“平日里”。

虽然结构与行动者为双向建构，但为摆脱“只见社会，不见人”（音乐领域的人与社会与文化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我们的田野应该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人。通过人们在平日的那些“超越平日”的事件与切口的描写与阐释，最终达到“意会”。

#### 参考文献

- [1] 刘桂腾.生熟之道——螺旋攀升式的音乐民族志书写[J].

- 黄钟,2022,(04):61.
- [2] 应星.“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在科学与艺术之间 以《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为例[J].社会.2018,38(01):33.
- [3] 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G].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1-20.
- [4]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5] 卡尔·G·海德著,田广,王红译.影视民族学[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 [6] 刘桂腾.音乐影像志讲义[M],上海音乐出版社,2024.
- [7] 陈铭道.西方民族音乐学十讲:历史、文献与写作[M],上海音乐出版社,2010.
- [8] 保罗·拉比诺著、高丙中、康敏译.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 [9] 萧梅.田野的回声:音乐人类学笔记[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

**版权声明:** ©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